

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创业决策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家章¹，杜妍¹，郭龙飞²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2. 北京物资学院 经济学院，北京 101149)

摘要：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了人力资本效应、市场环境效应和高工资效应在创业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改善市场环境，进而对创业决策产生溢出效应；通过提升员工工资水平增加创业决策的机会成本，对创业决策产生挤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因创业类型、创业行业、创业地区和创业者国际教育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于生存型、制造业、西部地区 and 没有留学背景的创业个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创业决策的影响为溢出效应，而对东部地区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创业决策则表现为挤出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效应；市场环境效应；高工资效应；创业决策

[中图分类号] F016;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2)05-0054-15

引言

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展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活动，不仅能有效促进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还能增加社会供给并激发市场活力，是普通大众分享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红利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中国的创业环境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创业生态系统指数从2017年的全球第48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7位和亚洲第1位^①，2020年新设市

[收稿日期] 2021-10-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20BJY193)

[作者简介] 赵家章(1980—)，男，山东巨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杜妍(1996—)，女，河北承德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网络与国际贸易；(通讯作者)郭龙飞(1991—)，男，河南鹤壁人，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①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报告每年由Startup Genome公司发布，该报告对全球的创业生态进行总体分析和排名。

场主体达2 300多万户^①，且保持较高的活跃度。随着中国改革与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中国的超大市场规模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增强。2020年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规模为1 63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虽然创新创业与对外开放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但遗憾的是，较少有学者从外资角度出发探究其与创业决策之间的联系。通常来说，具备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效率的高质量外资，可以通过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本土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区域经济和营商环境，进而有利于改善创业活动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另外，FDI还会影响到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条件和心理特征，进而影响个体的创业行为（许和连和梁亚芬，2019）。当前，创新创业已成为促进“双循环”发展的重要动力，从FDI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和深化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对实施区域差异化FDI政策方针、促进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动及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哪些因素会影响创业决策？相关研究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第一，个人特质会对创业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如个体对待风险的态度、个体性别及认知能力等（Van和Cramer，2001；Michael和Mueller，2004；周洋和刘雪瑾，2017）。第二，个体所处的家庭内部环境对创业决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创业意愿的代际传递，在家庭的创业决策下，孩子更有可能继承父辈的创业项目，并且获得更低成本的创业资本（Fairlie和Robb，2007）。第三，社会外部环境也是决定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如制度环境、信贷环境等（Black和Strahan，2002；田毕飞和陈紫若，2017）。总体而言，以往研究更多地探究了创业个体自身特质及所处家庭内部环境与社会外部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各国间越来越频繁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FDI与创业之间的关系，但结论尚未统一。一方面，部分研究发现FDI的引入对本土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yyagari和Kosová，2010），原因可能在于：首先，FDI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FDI企业）的本土员工获取更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能，促进其在相同或相关行业中进行创业，进而形成人员流动效应（Fu，2012）。其次，FDI企业的进入可能在本土市场中形成“示范效应”，有助于本土潜在创业者模仿、学习和吸纳更多来自外商的技术知识和商业模式，进而促进创业决策（Meyer和Sinani，2009；Pitelis和Teece，2010；De Maeseneire和Claeys，2012）。最后，FDI企业的进入可能会增加本土市场中与其相关的上下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创造本土居民的创业机会（Albulescu和Tămășilă，2014）。另一方面，FDI可能会抑制个体创业，具体表现为高工资效应、市场进入壁垒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加剧（田毕飞和陈紫若，2017；王戴黎，2014；De Backer

^①数据来源：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联合天眼查公司发布的《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11-2020）》。

和 Sleuwaegen, 2003)。通常情况下, FDI 企业为员工支付的薪酬往往优于东道国本土企业, 这就吸引了潜在创业人员到外企工作, 形成高工资效应(田毕飞和陈紫若, 2017)。同时, FDI 企业的进入不仅会增加东道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平均薪资待遇和创业决策的机会成本, 还会抑制创业倾向(王戴黎, 2014), 加剧市场中优胜劣汰的现象, 使企业间、产品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进而提高了市场的进入壁垒(De Backer 和 Sleuwaegen, 2003)。还有研究发现 FDI 与创业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且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地方化现象(田毕飞和陈紫若, 2016)。诸多文献从外部创业环境和创业成本视角出发, 阐释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 FDI 对潜在创业者的影响是如何进一步决定个体创业决策的。本文预期, FDI 会通过提高本土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工资薪酬水平, 进而影响创业决策。另外, 创业环境也是影响本土居民是否会进行创业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 本文尝试从人力资本效应、市场环境效应及高工资效应三个方面出发, 进一步拓展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相较于已有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 研究视角上, 本文从微观层面探究了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考察了 FDI 对创业决策产生的人力资本效应和高工资效应, 归纳了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并采用微观数据进一步验证了 FDI 影响创业决策的传导机制。第二, 研究方法上, 现有文献大多从制度和环境方面考虑选取 FDI 影响创业决策的工具变量, 而本文从地理视角出发, 采用各省份距离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作为 FDI 影响创业决策的工具变量, 较好地克服了本研究的内生性问题。第三, 研究内容上, 本文分别考虑了在不同的创业类型、创业行业、创业地区和创业者国际教育背景下, FDI 对创业决策的异质性影响。这为今后各地政府实施不同的 FDI 政策, 以促进全社会的大众创业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二、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1. 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该调查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 2009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随后于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四次成功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家庭随机调查抽样。其中, 2017 年调查样本覆盖全国 29 个省, 355 个县, 1 428 个村, 样本规模为 40 011 户, 问卷结构较为完善, 样本数据具备时效性。因此本文主要使用 2017 年 CHFS 微观数据, 并参考尹志超等(2015)的做法, 根据 CHFS 问卷中受访者的个人职业是否属于“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识别个体是否创业(*entrep_indiv*), 依据问卷中家庭是否从事“个体经营或企业经营”识别家庭是否创业(*entrep_family*)。另外, 个体层面特征变量包括: 年龄(*age*)、是否为男性(*male*)、是否已婚(*married*)、是否为本地户口(*hukou*)及个体拥有住房数量(*hou_num*)等。本文对年龄这一控制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 宏观层面数据

本文使用省份层面 FDI 增长率 (*fdi_rate*) 作为 FDI 的代理变量, 由于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效果存在滞后性, 参考张开迪等 (2018) 的做法, 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 FDI 增长率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地, 使用 2016 年和 2015 年的 FDI 规模差值占 2016 年 FDI 规模的比重对 FDI 增长率进行衡量。此外, 参照田毕飞和陈紫若 (2017) 的做法, 省份层面的特征变量包括: 人均 GDP 增长率 (*gdp_rate*)、城镇失业率 (*ump_rate*) 和城镇常住人口增速 (*pop_rate*),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各省份与海港港口的地理距离

根据 2006 年我国政府部门公布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 测算出中国各省份到沿海港口的最近距离, 用于构建工具变量。

表 1 汇报了各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其中, 个体创业的均值为 0.49, 家庭创业的均值为 0.19, 表明 CHFS (2017) 问卷中 49% 的个体和 19% 的家庭选择创业, 个体创业概率比家庭创业概率高 30% 左右。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中, 样本中男女比例近乎相同, 本文将个体年龄限定在 18~64 岁之间, 这对应了样本中较高的已婚比例, 即 79%。同时, 拥有本地户口的被访者占总样本的 58%, 人均拥有住房数量为 1.27 套。

表 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ntrep_indiv</i>	个体是否创业	0.49	0.50	0	1
<i>entrep_family</i>	家庭是否创业	0.19	0.39	0	1
<i>fdi_rate</i>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 (%)	-0.19	0.65	-2.68	0.61
<i>lnage</i>	年龄的对数	3.71	0.34	2.89	4.16
<i>male</i>	是否为男性	0.50	0.50	0	1
<i>married</i>	是否已婚	0.79	0.41	0	1
<i>hukou</i>	是否为本地户口	0.58	0.49	0	1
<i>hou_num</i>	拥有住房数量	1.27	0.59	0	27
<i>gdp_rate</i>	城镇 gdp 增长率 (%)	0.07	0.03	0.01	0.11
<i>ump_rate</i>	城镇失业率 (%)	3.28	0.65	1.41	4.22
<i>pop_rate</i>	城镇人口规模增长率 (%)	0.03	0.02	-0.01	0.11
<i>dist</i>	距离最近海港港口的距离 (km)	408.77	378.68	5.07	2 658.57

(二) 模型设定

借鉴既有文献(阮荣平等, 2014)的做法, 本文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text{pr}(\text{entrep_indiv}_{ij} = 1) = \beta_0 + \beta_1 \text{FDI_rate}_j + \text{Control}_i + \text{Control}_j + \varepsilon_i \quad (1)$$

$$\text{pr}(\text{entrep_family}_{ij} = 1) = \lambda_0 + \lambda_1 \text{FDI_rate}_j + \text{Control}_i + \text{Control}_j + \varepsilon_i \quad (2)$$

式(1)和式(2)中, i 和 j 分别代表不同个体和省份。其中, 被解释变量 entrep_indiv_{ij} 和 $\text{entrep_family}_{ij}$ 分别代表地区 j 的个体 i 或家庭 i 是否创业, 创业则取值“1”, 反之为“0”; FDI_rate_j 表示省份 j 的 FDI 增长率, 作为 FDI 的代理变量,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Control_i 代表个体 i 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年龄 (lnage)、性别 (male)、婚姻状况 (married)、是否为本地户口 (hukou) 及拥有住房数量 (hou_num); Control_j 代表省份 j 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 GDP 增长率 (gdp_rate)、失业率 (ump_rate) 和城镇人口规模增长率 (pop_rate); ε_i 表示随机扰动项。特别地, 由于被解释变量 entrep_indiv_{ij} 和 $\text{entrep_family}_{ij}$ 是 0~1 虚拟变量, 本文主要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利用 Pr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 由于核心解释变量的变化来自省份层面, 为了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空间相关问题, 本文参考 Bertrand 等(2004)的做法, 按照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调整。

三、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 列(1)至列(3)和列(4)至列(6)分别汇报了 FDI 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其中, 列(1)和列(4)分别汇报了未加入控制变量时, FDI 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 FDI 的增长能显著地促进个体和家庭的创业决策。而后, 列(2)和列(5)纳入省份层面控制变量。列(3)和列(6)在列(2)和列(5)的基础上, 再次加入个体层面控制变量。表2中列(3)汇报了考虑全部控制因素后, FDI 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回归结果表明, FDI 增长率对个体创业决策的边际影响系数为 0.053, 说明 FDI 增长率每提升 1%, 个体创业决策的可能性会提高 5.3%。同时, 表2列(6)的回归结果表明, FDI 在 1%水平上显著地促进了家庭创业决策, 其边际影响系数为 0.009。综上, FDI 对个体和家庭创业决策均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 从省份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增长率也会影响创业决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个体和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而在人口增速更快的地区, 家庭更有可能进行创业活动。可能的原因在于, 人口规模增速更快的地区可能存在更大的市场需求, 因而有利于家庭创业的发展。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回归系数表明, 年龄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显著为负, 即一个人年纪越大, 选择创业的倾向越小; 男性虚拟变量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回归系数为 0.036, 表明中国男性比女性创业的可能性高 3.6%左右; 对于已婚家庭和拥有本地户口的个体而言, 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高。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1)	(2)	(3)	(4)	(5)	(6)
<i>fdi_rate</i>	0.052*** (0.003)	0.052*** (0.003)	0.053*** (0.003)	0.012*** (0.002)	0.012*** (0.002)	0.009*** (0.002)
<i>gdp_rate</i>	—	0.628*** (0.096)	0.534*** (0.097)	—	0.351*** (0.061)	0.250*** (0.064)
<i>ump_rate</i>	—	0.002 (0.003)	0.006 (0.004)	—	-0.0005 (0.002)	-0.0004 (0.002)
<i>pop_rate</i>	—	-0.013 (0.164)	-0.393* (0.170)	—	0.602*** (0.099)	0.542*** (0.108)
<i>lnage</i>	—	—	-0.433*** (0.009)	—	—	-0.130*** (0.006)
<i>male</i>	—	—	0.036*** (0.004)	—	—	0.006 (0.003)
<i>married</i>	—	—	0.063*** (0.007)	—	—	0.077*** (0.004)
<i>hukou</i>	—	—	0.042*** (0.003)	—	—	0.002 (0.005)
<i>hou_num</i>	—	—	0.002 (0.004)	—	—	0.060*** (0.002)
N	53 622	53 622	49 755	79 933	79 933	70 705

注：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 内生性检验

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主要是由于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问题的存在。考虑到个体创业决策对该地区FDI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模型内生性源于反向因果的可能性较小，但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内生性偏误问题，如地区政商关系、创业支持政策等，均会对创业决策产生潜在影响。为了更好地缓解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构建工具变量和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解决上述问题。利用2006年我国政府部门公布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的数据，使用各省份与最近港口的距离(*dist*)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有二：第一，因省份地理位置不变，省份与最近港口的距离(*dist*)是既成事实，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该变量具有严格的外生性。第二，城市与其最近港口间的地理距离会影响贸易活动中的“冰山成本”，进而影响FDI增长(贺培和刘叶，2016)，因此，省份与最近港口的距离(*dist*)与FDI具有相关性。

本文选取省份与最近港口的距离(*dist*)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FDI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和列(3)为工具变量*dist*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回归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省份与最近港口的距离对 FDI 的回归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同时,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的 F 统计值均大于经验值 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 3 列 (2) 和列 (4) 的回归结果表明,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此外,对比表 2 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表 3 中 FDI 对创业决策的回归系数均大于基准结果中的回归系数,这意味着 Logit 模型产生了正向偏误,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存在政策优势或营商环境优越等外部因素影响到创业决策及 FDI 增长;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创业活动同 FDI 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基准回归结果中的影响系数被低估。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1) 一阶段	(2) 二阶段	(3) 一阶段	(4) 二阶段
<i>fdi_rate</i>	—	0.184*** (0.011)	—	0.055*** (0.007)
<i>dist</i>	-0.001*** (0.000)	—	-0.001*** (0.000)	—
<i>gdp_rate</i>	2.992*** (0.110)	0.767*** (0.100)	-3.106*** (0.094)	0.315*** (0.062)
<i>ump_rate</i>	-0.045*** (0.003)	0.023*** (0.004)	0.036*** (0.003)	0.006** (0.002)
<i>pop_rate</i>	6.787*** (0.168)	-0.569*** (0.175)	6.941*** (0.141)	0.470*** (0.108)
<i>lnage</i>	-0.014 (0.012)	-0.439*** (0.009)	-0.005 (0.009)	-0.128*** (0.006)
<i>male</i>	0.011** (0.006)	0.034*** (0.004)	0.004 (0.005)	0.005* (0.003)
<i>married</i>	0.033*** (0.009)	0.060*** (0.007)	0.038*** (0.007)	0.080*** (0.004)
<i>hukou</i>	0.043*** (0.006)	0.036*** (0.005)	0.034*** (0.005)	0.001 (0.003)
<i>hou_num</i>	0.005 (0.004)	-0.0003 (0.004)	0.005 (0.003)	0.066*** (0.003)
N	49 755	49 755	70 705	70 705

(三)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主要从变更模型的估计方法和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两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估计方法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对计量方法敏感,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对式 (1) 和式 (2) 进行再次

估计。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实证过程中使用的单一核心解释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有必要进一步采用不同的FDI度量方式。因此,本文采用2014—2016年三年内FDI规模均值($\ln fdi_3$)和2012—2016年五年内FDI规模均值($\ln fdi_5$)再次度量FDI,对数处理后将上述变量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汇报系数代表边际效应。其中,列(1)和列(4)分别汇报了使用Probit模型考察的FDI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可以发现,FDI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中FDI的回归系数基本一致,且FDI对创业决策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4中列(2)和列(5)分别汇报了FDI规模三年均值的对数($\ln fdi_3$)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回归所得的结果;列(3)和列(6)分别汇报了FDI规模五年均值的对数($\ln fdi_5$)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利用多期FDI规模均值作为FDI的代理变量时,FDI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显著为正。综上,稳健性结果表明,在变更模型的估计方法和FDI度量方式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1)	(2)	(3)	(4)	(5)	(6)
	Probit	$\ln fdi_3$	$\ln fdi_5$	Probit	$\ln fdi_3$	$\ln fdi_5$
<i>fdi_rate</i>	0.053 *** (0.003)	0.038 *** (0.002)	0.039 *** (0.002)	0.009 *** (0.002)	0.007 *** (0.001)	0.007 *** (0.001)
<i>gdp_rate</i>	0.536 *** (0.097)	0.035 *** (0.098)	0.068 (0.098)	0.251 *** (0.064)	0.168 ** (0.065)	0.172 ** (0.065)
<i>ump_rate</i>	0.006 (0.004)	-0.006 (0.004)	-0.007 * (0.004)	-0.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i>pop_rate</i>	-0.403 * (0.170)	0.935 *** (0.177)	0.923 *** (0.177)	0.561 *** (0.109)	0.786 *** (0.115)	0.784 *** (0.116)
<i>lnage</i>	-0.434 *** (0.009)	-0.435 *** (0.009)	-0.435 *** (0.009)	-0.131 *** (0.006)	-0.130 *** (0.006)	-0.130 *** (0.006)
<i>male</i>	0.036 *** (0.004)	0.036 *** (0.004)	0.036 *** (0.004)	0.006 (0.003)	0.006 * (0.003)	0.006 * (0.003)
<i>married</i>	0.062 *** (0.007)	0.062 *** (0.007)	0.062 *** (0.007)	0.078 *** (0.004)	0.077 *** (0.004)	0.077 *** (0.004)
<i>hukou</i>	0.041 *** (0.005)	0.044 *** (0.005)	0.045 *** (0.005)	0.002 (0.003)	0.002 (0.003)	0.003 (0.003)
<i>hou_num</i>	0.002 (0.004)	-0.001 (0.004)	-0.001 (0.004)	0.063 *** (0.003)	0.059 *** (0.002)	0.059 *** (0.002)
N	49 755	49 755	49 755	70 705	70 705	70 705

四、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 机制检验

上文的实证研究表明, FDI 能显著促进个体或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 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一方面, 本文预期 FDI 会通过提升本土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创业决策, 原因如下: 首先, 既有文献阐释了 FDI 对创业决策的示范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 对于本土潜在创业者而言, FDI 企业的进入为本土市场带来新的技术或组织形式, 有利于本土潜在创业者的学习和模仿, 进而促进创业决策 (Pitelis 和 Teece, 2010)。其次, FDI 企业的进入可能会在行业内形成人员流动效应,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投入, 因为在 FDI 企业工作的本土员工可以利用已获得的技能和经验在相同或相关行业中进行创业 (Fu, 2012)。综上, 通过示范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 FDI 均有助于提升本土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因而可能会促进创业决策。另一方面, FDI 有利于改善本土市场的营商环境, 如完善制度环境、提高本土市场工资水平等。依据信号传递理论, 高水平的制度环境能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投资和创业环境, 释放积极的市场信号, 有助于减少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 进而促进创业活动。而本土市场工资水平的提升则可能吸引潜在创业者放弃创业机会, 选择进入外资企业工作, 进而抑制本土创业 (田毕飞和陈紫若, 2017)。因此, 通过市场环境效应, FDI 有利于促进创业决策; 而通过高工资效应, FDI 则会抑制创业决策。

进一步地, 本文分别对人力资本效应、市场环境效应和高工资效应三种经济机制进行检验。首先, 借鉴文献中常用的处理方式 (Barro 和 Lee, 2001; 李静和楠玉, 2019), 采用 2017 年 CHFS 问卷数据来测算省份层面的个体平均受教育年限 (*edu_year*), 用来衡量省份层面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次, 使用 CHFS 问卷中“工作实际获得多少税后货币工资”衡量个体薪资水平 (*lnwage*)。再次, 从 FDI 能否改善市场开放程度这一角度出发, 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各省份拥有我国港澳台地区企业数量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的加总, 度量各省份的市场开放程度 (*lnwzqy*), 以此表征该地区的市场环境。最后, 基于上述指标构建, 本文分别对上述机制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表 5 汇报了 FDI 促进创业决策的机制检验结果。首先, 表 5 中的列 (1) 和列 (2) 汇报了人力资本效应的机制检验, 列 (1) 回归结果表明, FDI 会通过示范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提升本土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进而增加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列 (2) 将人力资本机制变量纳入到基准回归模型之中, 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创业决策, 且同基准回归结果相比, 加入人力资本水平变量后 FDI 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下降, 验证了人力资本水平是 FDI 影响创业决策的传导机制之一。其次, 表 5 中列 (3) 和列 (4) 考察了 FDI 的市场环境效应。列 (3) 的回归结果表明, FDI 的提升能增加市场开放度, 进而有利

于本土吸纳更多的资源,如专业化人才、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等,资源的积累会增加创业决策的概率。列(4)进一步考察了加入市场开放度指标后FDI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影响系数显著下降,说明市场开放水平的提升也能进一步促进创业决策。因此,FDI产生的市场环境效应也是促进创业决策的传导机制之一。再次,表5中列(5)和列(6)汇报了高工资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列(5)发现FDI能显著提升本土市场的个体工资水平,FDI企业为本土居民带来高薪和稳定的外企就业岗位,因而FDI加大了创业决策的机会成本,进而抑制个体的创业倾向。列(6)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个体工资水平,结果发现个体工资水平和创业决策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个体工资水平的提升会抑制创业决策,同时FDI对创业决策的影响量级明显下降,也进一步验证了FDI影响创业决策的高工资效应。综上所述,FDI的人力资本效应、市场环境效应和高工资效应对创业决策的传导机制得以证实。

表5 FDI对创业决策的内在机制检验

变量	人力资本效应		市场环境效应		高工资效应	
	(1)	(2)	(3)	(4)	(5)	(6)
	<i>OLS</i>	<i>Logit</i>	<i>OLS</i>	<i>Logit</i>	<i>OLS</i>	<i>Logit</i>
	<i>edu_year</i>	<i>entrep_indiv</i>	<i>lnwzqy</i>	<i>entrep_indiv</i>	<i>lnxz</i>	<i>entrep_indiv</i>
<i>fdi_rate</i>	0.478*** (0.036)	0.050*** (0.003)	0.589*** (0.009)	0.033*** (0.004)	0.040*** (0.007)	0.040*** (0.005)
<i>edu_year</i>	—	0.011*** (0.000)	—	—	—	—
<i>lnwzqy</i>	—	—	—	0.036*** (0.001)	—	—
<i>lnwage</i>	—	—	—	—	—	-0.019*** (0.005)
<i>gdp_rate</i>	-11.29*** (0.774)	0.623*** (0.096)	21.57*** (0.204)	-0.255* (0.102)	3.646*** (0.157)	0.059 (0.130)
<i>ump_rate</i>	0.081** (0.029)	0.005 (0.004)	-0.091*** (0.009)	0.010** (0.004)	-0.023*** (0.006)	0.011* (0.005)
<i>pop_rate</i>	-8.313*** (1.339)	-0.294 (0.169)	-36.99*** (0.448)	0.947*** (0.178)	-5.089*** (0.285)	-0.222 (0.233)
<i>lnage</i>	-2.008*** (0.081)	-0.412*** (0.009)	0.082*** (0.022)	-0.434*** (0.009)	-0.279*** (0.017)	-0.210*** (0.014)
<i>male</i>	1.077*** (0.037)	0.025*** (0.004)	-0.006 (0.011)	0.036*** (0.005)	0.209*** (0.008)	-0.020** (0.006)
<i>married</i>	1.688*** (0.057)	0.050*** (0.007)	0.079*** (0.017)	0.060*** (0.007)	0.196*** (0.012)	0.025** (0.009)
<i>hukou</i>	0.385*** (0.037)	0.032*** (0.004)	-0.016*** (0.012)	0.043*** (0.005)	-0.300*** (0.008)	0.264*** (0.007)
<i>hou_num</i>	0.063* (0.027)	0.002 (0.004)	0.144*** (0.010)	-0.003 (0.004)	0.124*** (0.009)	-0.043*** (0.006)
N	70 519	49 649	70 705	49 755	27 054	24 781

注:表中列(2)、列(4)和列(6)汇报的系数为边际效应。

(二) 异质性分析

上文解释了 FDI 影响创业决策的经济机制, 本部分将进一步考察 FDI 对创业决策的异质性影响。具体地, 本文围绕创业类型、创业行业、创业地区和创业者海外教育背景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 参照 Schoar (2010) 和张萃 (2018) 的做法, 本文对创业类型 (*entrep_live*) 进行区分。依据 CHFS 问卷中“除您和您家庭成员以外, 目前该项目还雇佣了多少员工? 包括目前雇佣的临时工”这一问题进行划分, 若样本为“0”, 则 *entrep_live* 取值为“1”, 为生存型创业 (Subsistence Entrepreneurship), 若大于或等于“1”, 则 *entrep_live* 取值为“0”, 为机会型创业 (Transfor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其次, 依据 CHFS 问卷中“这个创业项目属于什么行业”这一问题对个体和家庭选择的创业行业 (*industry*) 进行分类。若为制造业, 则 *industry* 取值为“1”; 若为服务业, 则 *industry* 取值为“0”^①, 而后构建 FDI 同创业行业的交互项 (*fdi_rate*×*industry*)。再次, 将全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region*), 以分样本考察 FDI 对创业决策的区域差异化影响。最后, 根据 CHFS 问卷中“学位是否国外获得”考察创业者的跨国背景 (*kgbj*) 是否会引致 FDI 对创业决策的异质性影响, 若受访者学位是在国外获得, 则 *kgbj* 取值为“1”, 若不是, 则取值为“0”。上述异质性检验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

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首先, 本文使用分样本检验的方法考察 FDI 对不同类型创业决策的影响。列 (1) 和列 (2) 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 FDI 会显著促进生存型创业决策, 而对机会型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 FDI 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 在抑制本土企业的进入率的同时提高企业退出率 (De Backer 和 Sleuwaegen, 2003), 这可能导致部分失业人员不得不选择生存型创业以获取收入, 因此生存型创业受到 FDI 溢出效应的影响更强。其次,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纳入创业行业 (*industry*) 和创业行业同 FDI 的交互项 (*fdi_rate*×*industry*), 以考察不同创业行业中 FDI 对创业决策的异质性影响。列 (3) 的回归结果表明, 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即 FDI 更能促进服务业创业决策。创业行业受 FDI 影响的差异性的可能原因在于: 较制造业而言, 服务业行业的投入结构、生产技术更加相似, 服务业行业创业者可以吸收更多来自 FDI 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知识或技术等。因此, FDI 对服务业行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再次, 本文考察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FDI 影响创业决策的差异性, 此差异可能源于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配备情况、资源储备等, 表 6 中列 (4) 至列 (6) 使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分别汇报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FDI 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

^①问卷中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被归为制造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业;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被归为服务业。

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因素,在发达程度、技术水平或是FDI流量与存量方面都远高于西部地区,因此,FDI增长更多表现为加剧本土市场竞争和提高创业门槛(潘文卿,2003),引致高工资效应和增加创业成本,从而对个体创业决策产生挤出效应。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FDI增长更多体现为人力资本效应和市场环境效应,通过提高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和改善市场创业环境,进而对个体创业决策产生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考察了个体的国际留学背景是否会影响FDI与创业决策的关系。表6列(7)和列(8)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于“未获得国外学位”个体的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获得国外学位”的个体而言,FDI对其创业决策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未在国外获得学位”的个体,海归人才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可能面临本土人脉不足、社会资本薄弱等问题,而“未在国外获得学位”的个体在本地可能拥有更紧密的社会关系,也更易获得创业所必需的社会资源。因此,FDI更有利于促进“未在国外获得学位”的个体进行创业。

表6 FDI影响创业决策的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i>entrep_indiv</i>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行业差异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获得国外学位	未获得国外学位
	(1)	(2)	(3)	(4)	(5)	(6)	(7)	(8)
<i>fdi_rate</i>	0.033*** (0.008)	0.007 (0.014)	0.031*** (0.007)	-0.053*** (0.012)	-0.056 (0.131)	0.095*** (0.009)	0.049 (0.037)	0.033** (0.011)
<i>industry</i>	—	—	0.014 (0.011)	—	—	—	—	—
<i>fdi_rate</i> × <i>industry</i>	—	—	-0.048* (0.023)	—	—	—	—	—
<i>gdp_rate</i>	0.139 (0.244)	-0.094 (0.361)	0.422* (0.183)	0.706* (0.320)	1.599* (0.675)	4.009*** (0.863)	-0.138 (0.783)	0.070 (0.243)
<i>ump_rate</i>	-0.011 (0.009)	-0.003 (0.012)	-0.005 (0.007)	-0.001 (0.005)	0.035** (0.011)	0.015 (0.013)	-0.024 (0.025)	-0.014 (0.008)
<i>pop_rate</i>	-0.446 (0.448)	-1.221 (0.650)	-0.833* (0.333)	0.836* (0.350)	-2.887** (0.969)	-9.062*** (1.478)	0.391 (1.295)	-0.696 (0.405)
<i>lnage</i>	-0.084*** (0.022)	-0.059 (0.037)	-0.149*** (0.018)	-0.383*** (0.014)	-0.556*** (0.018)	-0.427*** (0.019)	-0.400*** (0.115)	-0.414*** (0.034)
<i>male</i>	0.001 (0.010)	0.079*** (0.016)	0.018* (0.008)	0.019** (0.007)	0.054*** (0.009)	0.059*** (0.010)	0.022 (0.038)	0.083*** (0.012)
<i>married</i>	0.115*** (0.019)	0.103*** (0.029)	0.099*** (0.014)	0.062*** (0.010)	0.109*** (0.014)	0.054*** (0.014)	0.005 (0.053)	0.018 (0.016)
<i>hukou</i>	-0.007 (0.011)	0.062*** (0.016)	0.044*** (0.008)	0.127*** (0.007)	0.008 (0.010)	-0.025* (0.011)	0.146** (0.056)	0.139*** (0.018)
<i>hou_num</i>	-0.014 (0.009)	-0.002 (0.008)	-0.009 (0.005)	-0.002 (0.005)	0.002 (0.009)	-0.012 (0.011)	-0.038 (0.029)	-0.001 (0.008)
N	7 284	3 033	13 780	22 637	10 408	9 460	608	6 080

注:表中汇报的系数均为边际效应。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匹配数据,考察了FDI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证明了FDI会显著促进个体和家庭的创业决策,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该结论的可靠性。(2)机制分析揭示了FDI影响创业决策的传导机制。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市场环境效应,FDI能促进创业决策的发生。另一方面,FDI的高工资效应会对创业决策产生抑制作用。(3)本文进一步针对FDI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在不同创业类型、创业行业、创业地区和创业者国际背景下的异质性展开讨论,结果发现,FDI显著促进了生存型创业、服务业创业、西部地区创业和没有国际留学背景个体的创业,但对东部地区的创业决策表现为抑制作用。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1)积极发挥FDI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的溢出效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提供技术和金融支持等渠道改善本土投资环境和制度环境,在防止外资大量出逃的同时培育本国吸引外资进入的新优势。(2)充分挖掘合资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以促进本土创业决策,鼓励本土企业吸纳外资企业中的高精尖人才,以获取FDI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发挥FDI的人力资本效应对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3)对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政府应进一步简化外资引进流程、放宽FDI准入门槛,以吸引外资进入,提升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改善市场创业环境,切实提高西部地区企业吸纳FDI企业的先进技术、创业资源的能力。(4)对于东部地区而言,FDI的增加更多地表现为加剧本土市场竞争,提高本土市场工资水平。因此,政府宜出台对本土企业的扶持政策,如税收减免、贷款扶持等,同时应侧重于吸纳高技术行业的FDI以提升整体创业水平。

[参考文献]

- [1]贺培,刘叶. 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地理距离工具变量的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6(6): 79-86.
- [2]李静,楠玉. 人力资本错配下的决策: 优先创新驱动还是优先产业升级[J]. 经济研究, 2019(8): 152-166.
- [3]潘文卿. 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03(6): 3-7+80.
- [4]阮荣平,郑风田,刘力. 信仰的力量: 宗教有利于创业吗[J]. 经济研究, 2014(3): 171-184.
- [5]田毕飞,陈紫若. FDI对中国创业的空间外溢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8): 40-57.
- [6]田毕飞,陈紫若. FDI、制度环境与创业活动: 挤入效应与补偿机制[J]. 统计研究, 2017(8): 19-31.

- [7]王戴黎. 外资企业工作经验与企业家创业活动: 中国家户调查证据[J]. 管理世界, 2014(10): 136-148.
- [8]许和连, 梁亚芬. 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家精神[J]. 财贸研究, 2019(11): 26-38.
- [9]尹志超, 宋全云, 吴雨, 等.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 管理世界, 2015(1): 87-98.
- [10]张萃. 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J]. 经济研究, 2018(4): 151-166.
- [11]张开迪, 吴群锋, 高建, 等. 外商直接投资对大众创业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2): 79-96.
- [12]周洋, 刘雪瑾. 认知能力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7(2): 66-75.
- [13]ALBULESCU C T, TĂMĂȘILĂ M. The Impact of FDI 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European Countries[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24: 219-228.
- [14]AYYAGARI M, KOSOŮVÁ R. Does FDI Facilitate Domestic Entry?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18 (1): 14-29.
- [15]BARRO R J, LEE J W. 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1, 53 (3): 541-563.
- [16]BERTRAND M,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A Behavioral-economics View of Pover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2): 419-23.
- [17]BLACK S E, STRAHAN E P. Entrepreneurship and Bank Credit Availabilit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 (6): 2807-33.
- [18]DE BACKER K, SLEUWAEGEN L.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rowd Out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3, 22 (1): 67-84.
- [19]DE MAESENEIRE W, CLAEYS T. SM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e Case of Belgium[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 21 (3): 408-24.
- [20]FU X.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anageri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hrough the Diffusion of Management Practi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2, 49 (5): 970-99.
- [21]FAIRLIE R W, ROBB M A. Why are Black-owned Businesses Less Successful than White-owned Businesses? The Role of Families, Inheritances, and Business Human Capital[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7, 25 (2): 289-323.
- [22]MICHAEL F, MUELLER P. Effects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ime[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 (8): 961-75.
- [23]MEYER K E, SINANI E. When and Where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enerate Positive Spillovers?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 (7): 1075-94.
- [24]PITELIS C N, TEECE D J. Cross-border Market Co-creatio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0, 19 (4): 1247-1270.
- [25]SCHOAR A. The Divide between Sub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J].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2010, 10 (1): 57-81.
- [26]VAN P C M, CRAMER J S. The Root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Labour Demand: Individual Ability and Low Risk Aversion[J]. Economica, 2001, 68 (269): 45-62.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the Entrepreneurship Decision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inese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ZHAO Jiazhang¹, DU Yan¹, GUO Longfe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2.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this paper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FDI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and examined the role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human capital effect, market environment effect and high-wage effect i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It finds that FDI has a spillover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by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level and market environment. FDI has a crowding out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by increasing the salary level of employees to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the impact of FDI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is differen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entrepreneurial types, entrepreneurial industries, entrepreneurial regions and entrepreneurs'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s. For subsistence entrepreneurship, manufacturing entrepreneurship, western reg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Individuals without overseas study background, FDI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while for eastern regions, FDI has a crowding out effe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Keywords: FDI; Human Capital Effect; Market Environment Effect; High-wage Effect;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责任编辑 武 齐)